A Dysfunction Analysis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New Field of Party Building ——Based on Internet Thinking

Shang Linlin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Key words: new field,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dysfunction, internet thinking, ecological circl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bstract. In the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ecology 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ety and the party organization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e thinking awareness, the behavioral logic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rganization do not suit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behavioral logic in the new field, which brings about dysfun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new field, includ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overage and work coverage of the party, the discoordination between external impetus and internal dynamics of the party, and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management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responsibility work.. The Internet thinking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can not only provide a new dimension at the level of theory and value,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society structure differentia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bility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新兴党建领域基层党组织功能障碍^[1]探析 ——基于互联网思维视角

尚琳琳

华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广州，广东，中国

关键词：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功能障碍；互联网思维；社会发展生态圈

中文摘要。 互联网生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环境下，社会与党组织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组织的思维意识、行为逻辑与组织结构等传统“惯习”与新兴领域众多价值取向、运行逻辑形成诸多不适，造成基层党组织在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发展不平衡、党组织外部推动与新兴领域内部动力不协调、党建工作领导管理与责任工作落实机制有偏差等功能障碍。互联网思维为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如何克服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与重新整合而增加的功能发挥难度，在理念与价值层面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视角。

1. 引言

社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并称为三大新兴党建领域。[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框架下，党对新兴领域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是基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必

然性和应然性展开的。然而，受传统思维意识、行为逻辑与组织结构的拘囿，政党转型落后于社会转型的一般规律，使新兴党建领域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成为现实。

面对经济社会不断步入互联网化升级转型的当下，迫切需要代表上层建筑的执政党提升自身的思想意识，以先进理念做好党的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组织谋划，将互联网思维由上到下贯穿到党的建设的各级层面乃至基层党组织，引导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推进社会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不断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向党的工作覆盖和功能覆盖的深化，实现组织目标和群体愿景。

2. 互联网思维与基层党建谋划：“术”与“道”的革新

互联网在日益发展中形成了超时空、交互性、低成本、资源整合高效、个性化需求便捷的独特优势，异常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方式，甚至改变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互联网思维在对传统思维模式的颠覆过程中，直面社会环境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在深入体验、创造及不断革新中推动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在社会多元价值构成与结构体系中驱动着各利益共同体的和谐共进。因此，互联网在整个社会的应用过程中已不单纯是一种技术上的革新，甚至成为引领社会思潮与思维模式变革的理念与价值观。将互联网思维植入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谋划中，有利于基层党组织适应互联网生态环境下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立足新的社会形势与制度需求，促进自身建设在思维方式与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提升与转变，以获得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

2.1 基于用户思维，树立价值观念照的理念

一个政党在宣扬一种价值主张和践行一种方针理念时，不仅要让工作对象满足功能和情感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使其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和价值观的认同，以获得其对政党的趋赴。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用户思维即“用户至上”理念恰好契合了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因此，在现代社会，基层党组织有效的践行用户思维，才能在权力所及及不及的范围都能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2.2 基于平台思维，树立整合共享的理念

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为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体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交流、资源共享、合作共谋提供了更为便捷与广阔的开放平台。基于平台思维，党组织可以以开放的视野发动党内党外的各方力量，集聚各方智慧与资源，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进各方社会力量与利益主体的理念沟通和利益沟通，增强党组织的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和动员能力，进而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性。

2.3 基于跨界思维，树立异质共赢的理念

互联网不仅突破了时空的界限，而且打破了各种社会要素与活动方式的边界，以多元视角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加以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因此，基层党组织借助跨界思维，寻求党的建设与工作对象发展的结合点与连接点，突破制度化的局限与角色地位的演变，可以实现党的建设与工作对象异质共赢发展的目的。

2.4 基于品牌思维，树立引领传导的理念

互联网时代的品牌不再单纯代表的是产品或服务，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认同与文化共鸣。因此，基于互联网思维，基层党组织可以有效开展传播与宣传，提升组织形象与组织魅力，以“温度感”赢得工作对象的亲近与拥护，以党建品牌发挥示范和传导作用，不断扩大影响力与感召力。

2.5 基于社交思维，树立党群协同的理念

互联网实现了信息沟通与交流的现代化，从而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了社会交往的频繁度与紧密度。通过在交往与沟通中协调各种关系、解决各种问题、建设各种联系，营造出和谐共处的社交生态环境，可以促进基层党组织与工作对象的有效交流与沟通，消除认知上的分歧，在多元话语语境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话语权，在和谐交往中促进党群共谋发展。

3. 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现实境遇：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

新兴领域党建是当前党建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党建工作的短板。受传统“惯习”[3]的制约，基层党组织面对社会转型表现出相对地意识滞后与行动迟缓，从而导致基层党组织在新兴领域发挥作用的能力明显弱化。以新兴领域党建实践创新的先行者广州市为例，其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的具体表现为：

3.1 党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发展不平衡

加强新兴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基础在于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方向在于努力实现党建工作的全覆盖，关键在于党组织和党员要真正发挥作用。”[4]借助于政治与行政权力的推动，新兴领域党组织的覆盖面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提升，增幅明显。就广州市基层党组织而言，2016年社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单位党组织覆盖率已近100%。然而，在党组织基本全覆盖的背后，却存在着党的工作覆盖率低，党组织在作用的发挥上严重“失重”的现象，导致了党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表现为：从基层党组织的角度来说，广州本土社会普遍存在的较强实用主义意识倾向使基层党组织重辖区经济发展和短期内立见成效的工作，对于务虚的意识形态的工作在思想重视程度及工作方式方法的开拓上存在不足；从党员队伍的角度来说，党员结构的复合性、党员之间利益归属的分化、党员存在状态的不稳定性，在客观和主观上影响了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从新兴领域组织的角度来说，群众的身份复杂多样、价值与认识多元，业主的素质与观念不一，也为党建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难度。

3.2 党组织外部推动与新兴领域内部动力不协调

新兴领域党组织建设的动力一般来自于外部的推动作用，而非自发自觉的建立。在转型社会，由于组织特性与政治特性的分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普遍以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发展目标，与党组织的组织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交集与共识，导致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对党建工作存在严重的排斥和抵制态度，主观上认为党建工作会影响业务工作的开展，提高工作的成本、降低工作的效率；导致党员群众对党组织存在漠视和疏远的现象，认为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和生存竞争没有帮助，因而产生了意识上的偏离，加剧了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的弱势。

3.3 党建工作领导管理与责任工作落实机制有偏差

由于新兴领域众多组织与行业的特殊性，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之间只是一种党内组织关系或是组织挂靠、业务指导的关系，没有权力与责任的激励与制约。党组织负责人大都是兼职党的工作，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有限，责任意识较为淡薄。在党建实践过程中，考虑新兴领域党组织工作开展的特殊性和党员生存发展的特殊性，广州市探索了把党组织建立在商务楼宇、专业市场、居住区、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等地，力求推进党的组织管理由垂直型向区域型、单位型向社会型、固定型向流动型的转变。[5]党的组织管理形式呈现出“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态势，在促进党的组织覆盖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以上组织管理形式都没有具体明确党建主体责任，存在管理层级不清晰、责任不明确、关系不顺畅的问题。在对广州市新兴党建领域的调查中，有诸多党组织管理责任缺位、有名无实、党务干部队伍力量薄弱的反映。以上情况对党建工作的开展和党建功能的发挥造成了一定的制约。

4. 新兴党建领域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党组织与社会关系的改变

社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构成。在互联网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作用的共同推动下，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的互动更加频繁，成为共同推进社会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对此，基层党组织需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固着的思维模式，主动适应新兴领域的现实需求，以新的视野和方式促进党组织与工作对象的合力共进。然而，在社会现实发展中，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的运行和功能发挥面临着诸多的现实挑战和理念局限。

4.1 客观原因：新兴领域现实需求与基层党组织政治关联度的变化

在市场发育不足和互联网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社会对资本的获取具有明显的政治和行政化的特征。为获取更大的话语权和谋求更多的社会资源，社会对党组织具有强烈的依附性。互联网经济条件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日渐提升，并逐渐成为主动表达话语权和自主意识的社会参与者。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挥，单纯依靠发动组织群众已难以奏效，对党建工作对象进行意识形态及价值理念的强行灌输也已无法发生作用。从情感和功能角度激发工作对象的内生需求成为党建工作功能发挥的着眼点。同时，新兴领域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变的社会土壤，需要党组织的有效介入来填补政府退出出现的治理空缺，发挥制度供给、资源配置、人才占有和利益协调方面的政治功效，促成社会和谐。但是，基层党组织在对接踵而来的多元社会诉求和对“新常态”下政治秩序的引领过程中，表现出对资源延展与配置的乏力，导致了基层党组织政治和经济话语权的双重弱化。

4.2 主观原因：基层党组织工作理念、行为逻辑与新兴领域发展路径契合度的下降

互联网化的社会形态下，基层党组织应学会运用社会化思维，摆脱特立独行的高大上姿态，融入社会中，发挥执政党在政策资源和制度供给上的权力优势，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的和谐共谋发展。然而，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受传统思维和行为逻辑的支配，在工作理念上的发展确是远远落后于新兴领域自身的发展的。由于新兴领域组织与个体具有区别于传统单位的自主性、分散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使传统条件下的党建思维逻辑和运行机制无法有效满足新兴领域的发展需求，无法得到新兴领域组织与成员的支持，最终导致了基层党组织运行中的管理困境和动力缺失。

4.3 结构性原因：传统一元化的党建结构体系与价值实现多元化的新兴领域社会融合度的降低

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变下，基层党组织运行中的权力局限和能力弱化表现异常明显。新兴领域涵盖了众多政府权力退出的空间，在利益追求的目标选择中，需要基层党组织的有效介入来发挥价值引导和利益平衡功能，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凝聚价值共识，促成新兴领域的健康发展。然而，作为党的执政理念的终端践行者与推动者，基层党组织未能及时突破党政一体、分层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适应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寻求到一种平衡党、政府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扁平化、多样化的组织架构[6]。因此，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条件下，面对新兴领域的多元价值诉求，在介入社会治理的空间过程中，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在努力实现组织覆盖的同时，却未能更好地实现基层党建工作的有效覆盖和功能的有效覆盖，从而加剧了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运行的低效。

5. 破除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功能障碍”的路径选择：以互联网思维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挥

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和重新整合加大了党的基层组织功能发挥的难度。如何在新的组织体系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有效发挥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需要结合变化了的社会特征，以全新的思维重新加以谋划。对党组织而言，要实现自我的突破与转型，摆脱传统思维模式和传统“惯习”的束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自身由内而外的“华丽转身”。

5.1 达成与新兴领域组织的有效沟通

在各种社会关系与联系爆发式增长的互联网经济时代，高效准确的内部沟通和内外信息的交流可以促进协作有效进行，达成认同与共谋。因此，在移动互联网社会条件下，构建畅通无阻的信息沟通渠道和科学的舆论引导是党发挥领导职能，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移动互联网使社会交往沟通的效果被强化，并逐渐成为“社会走向和谐生态的一种标志”[7]。基层党组织与新兴领域组织的沟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交往。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是“互联网时代建立和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石。”[7]新兴领域党的基层组织是党

联系新兴领域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构建和保有党员与群众之间彼此的信赖和和谐关系，促进上级党委的外部推动和新兴领域组织内部动力的有效结合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基层党组织与新兴领域组织之间借助互联网的思维与平台实现有效的沟通与交往，可以更好地建立起信任乃至和谐共进的基础。

新兴领域的发展离不开党的先进理念的指引。因此，有效沟通的基础，首先，是理念的沟通。基层党组织可以探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兴领域的现实发展需要相结合，提升新兴领域的组织谋划与人力积淀，发挥凝聚力量和传导思想的指针作用。其次，是利益的沟通。利益的冲突与对立是损害和谐发展的最大障碍。“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要强化利益沟通的作用，破除分配制度和保障体系不完善条件下人们思想上的分歧和对党组织认识上的误解，利用平台思维，在强化沟通、价值引导、利益整合的过程中，打造多元利益主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扶持又共享共赢的社会发展生态圈。”[8]再次，是直接沟通取代间接沟通。互联网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了沟通的扁平化即零距离的直接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弥补基层党组织传统架构的缺陷，提高基层党建工作在市场经济特殊条件下的效率和效果。最后，是多元沟通取代一元沟通。”根据管理学中的“结构洞”[9]理论，管理者占据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一对多”的中介沟通者的身份要比与相关者保持更好地关系更为重要。[10]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可以借助其自身的政治核心优势，主动发挥辐射效应与影响力，积极搭建多维度、立体化、交互性的信息与资源网络，不断增强对新兴领域组织和成员的感召力与引领力。

5.2 推进与新兴领域组织的和谐共进

互联网经济时代，价值观念、组织氛围等社会因素的作用显著增强。实现价值整合，将一维的价值导向在多元的社会体系中获得认同；实现功能整合，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同基层社会的自治需要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利益整合，将政党需求与新兴领域组织的效益提升共同推进，是探寻基层党组织科学运行的动力机制。

1. 以用户思维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新兴领域组织发展同频共振

在信息渠道与价值理念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对党的认知不再单纯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符号化的主观感知，而成为一种立足当下现实生活的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认同。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引入互联网用户思维，就是科学构建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从群众中汲取营养自觉提高党组织的内生机体活力，并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获得主动权，从而进一步确立党组织的主导地位。

“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要立足党的建设与新兴领域建设在发展目标、资源互补、人才配置、科学管理等方面的结合点，利用互联网平台思维，积极搭建积聚社会资源、政治资源和价值权威的平台，拓展党建配置资源的能力，提升党员推动发展的能力。基层党组织要将组织创新与功能发挥有效嵌入新兴领域组织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助力新兴领域组织的发展获得新兴领域社会成员的认可与拥护。同时，以需求共同价值为基础，使党建工作的目标指向由组织覆盖深化为作用发挥，扩大党组织的社会认可度和执政基础，在党的政治逻辑与新兴领域组织运行逻辑有效契合的过程中，达成党建创新和新兴领域组织发展的协同共进。”[11]

2. 以跨界思维促进党组织功能发挥与新兴领域组织自治能力提升相倚为强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管理与领导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实现社会领导与管理的直接承担者，要创新性地构建服务型党组织，把基层党建工作内化到新兴领域各行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遵循获取新兴领域党建对象包括新生代产业工人、新生代知识分子、新生代行业专家、新生代行业从业人员在内的群体对政治参与和民主自治高度认可的宗旨，打造多元化、立体化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使新兴领域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生力军。在组织功能的拓展与新兴领域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的结合过程中，实现党组织功能覆盖深化和新兴领域有序发展的预期。

3. 以平台思维谋求党员价值实现与新兴领域成员利益满足相得益彰

“政党的理想信念和党员的行动要能够契合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终极追求，惟其如此，政党和政府的效能方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12]新兴领域党员民主权利的获得在以制度作为保障的同时，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要立足互联网经济社会的特点，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党组织内部扩展到外部、单一汇聚为协同多元的开放理念与方式开展基层组织工作，使党员在新兴领域有所作为，进而实现党员的价值满足。同时，新兴领域成员个体利益的满足也是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因此，维护新兴领域多元利益群体的正当权益，营造价值共识，促进新兴领域社会和谐发展，也应是基层党组织作为的重要内容与价值实现取向。

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强化是与党的目标和新兴领域社会发展愿景相联系的，其功能转型的动力是与新兴领域成员的利益实现、价值满足相协调的。互联网思维逻辑下，突破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功能障碍，就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资源配置权威与价值统合效能，匡正利益主体的行为走向，达成多元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推动新兴领域社会在制度的框架内良性发展。

致谢

本文为 2016 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互联网思维下广州基层党建品牌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6GZGJ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ferences

- [1]Maurice Duverge, political sociology: elem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Yang Zugong, Wang Dadong's translation,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pp. 165, 2007.
- [2]Wang Naibo, The New Pattern of Party Building at the Basic Level, *Party Building Reading Press*, pp. 152, 2012.
- [3]Zheng Changzh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the fundamental way out of the "marginalization" situation, *Marxism and Reality*, vol. 5, pp. 75-81, 2004.
- [4]Yin Deci, Guangzhou Party building Research report(2), *Guangdong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pp. 227, 2001.
- [5]Yin Deci, Guangzhou Party building Research report(2), *Guangdong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pp.11-39, 2001.
- [6]Cai Zhiqiang, Value guiding System: Social Harmon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ruling abilit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p. 260, 2013.
- [7]Shan Fengru et al, Management: Internet thinking and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pp. 311-312, 2015.
- [8][11]Shang Linli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Field with New thinking, *Guangming Daily*, Vol. 15, 18 July 2017.
- [9][10]Ronald Bot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Ren Min, Li Lu, Lin Hong's translatio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12] Cai Zhiqiang, Value guiding System: Social Harmon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ruling abilit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p. 119, 2013.